

忆李学勤老师的知遇之恩

■ 王纲怀

晴天霹雳

今年上海的数九寒天，几乎天天下雨。正月二十（2月24日），好不容易等来一个大晴天，屋里洒满了久违的阳光。九时许，一位好友发来一则“李学勤老师逝世”的微信，顿时令我目瞪口呆。还未回过神来，几个朋友陆续发来同样微信。真是一个晴天霹雳！我不得不

面对这个事实：尊敬的李学勤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！悲从心生，遂口占一首小诗发往朋友圈寄托哀思：“驾鹤西去何猝然，师恩如海未能还。千古流芳文脉情，哀思痛彻清华园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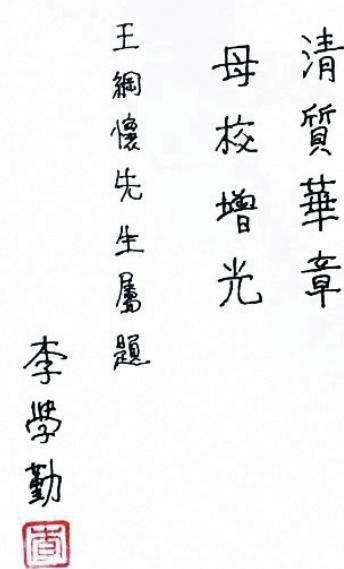
初识老师

我在母校的本科专业是土木建筑，毕业后长期从事工程

设计、水质处理、国土整治、城市发展等工作。因为这些与文科毫无交集，所以我认识李老师时间很晚。初识李老师是在2009年9月5日浙江绍兴的一个“铜镜与古代文明国际学术论坛”会议上。会前的一天下午，老师与师母刚住进宾馆，就有人递上一张铭文镜图片，请老师释读。我当时在边



作者（左）与李学勤老师的合影



二〇一五年十月

李学勤老师为《清华镜文化研究》一书题签

上说：“老师车马劳顿，是不是我先准备一个初稿，再请老师定夺。”晚饭后，经老师审定，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在我记忆中，通过这次很小的合作，似乎老师对我有了一些不错的印象。

不断提携

我对文科的爱好，一直属于业余性质。自2004年起至今，我一共出版了23本铜镜专著，其重点始终在铜镜铭文的收集、释读和研究方面。或许正是这个原因，得到了老师“得天独厚”的钟爱。为此，老师为4本拙著作序，分别是：《止水集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2月），《清华铭文镜》（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1年4月），《汉镜文化研究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4年6月），《汉镜铭文图集》（中西书局，2018年4月）。老师又专为拙著《清华镜文化研究》（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4月）一书题签。老师还在《汉镜文化研究》一书中，亲自撰写了《记·古镜写影·有字秦镜》的论文，为此书增光添彩。

呵护有加

老师对我始终呵护有加，多次为我主持学术活动或作主

题发言。如：2011年的铜镜捐赠仪式，2012年的《汉镜文化研究》开题会，2013年的《汉镜文化研究》结题会等。在一次学术研究讨论会上，老师坐上主持席后，突然叫我：“坐在我边上。”顿时让我热泪盈眶。

在清华简入藏母校不久的一次专家会议上，老师让我这个“简外人士”专程返校赴会，让我开拓视野、增长见识。会议结束前，老师还特别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我在研究铜镜铭文方面的情况。

我在铜镜研究上时不时会在学术问题上遇到困难，产生一些苦恼，甚至会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打击。李老师一次得知这些情况后，打电话跟我谈心，讲述他早年在学术研究中遭遇困境如何化解，让我深受教益，重拾信心。

独具慧眼

在拙著《汉镜铭文图集》的序言中，老师高瞻远瞩地提出：“这些年我曾几次呼吁，应该把古代铜镜的研究从一般的青铜器研究中分离出来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来看待。其所以提出这样主张，是鉴于我国的铜镜自创生以来，就与其他青铜器有不同传统。不仅从工艺或美术等角度看是如此，

即使谈到铜镜上的铭文，也和其他青铜器品类的铭文迥然有别。况且在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十年，铜镜的发现层出不穷，公私收藏较之过去何止倍增。这已经为铜镜的专门集中研究准备了充分的条件。”

老师太忙了，但是他还是在百忙之中眷顾铜镜研究的发展，独具慧眼地提出“古铜镜成为独立的学科”的倡议，并为之付出心血。

师恩难忘

老师是国内外顶尖的大学者，而我研究铜镜只是一个“业余爱好者”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自由地讨论学术问题。对于一面东汉“中平二年”铭纪年镜铭文的释读，老师先指出“波”字可通释“破”字，我得到启发，将左“贝”右“十”的“符号”读作“贼”字，铭文得以释读“黄贼破尽海众昌”，受到了老师的赞许。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“居毋宗”铭文镜，也是经老师细心释读，才有今日之表述。老师的道德文章，有口皆碑，老师的温良俭让，终身难忘。

老师安息！

（作者为清华大学顾问教授）